丁守和

绪　论

远在 150 多年以前,马克思就曾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学说。从《共产党宣言》问世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种种考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鼓舞了众多的人们向新的世界前进。

马克思的学说从 19 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的 100 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际，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现在正引导着全国人民为现代化事业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一、马克思学说开始传入中国

马克思的学说开始传入中国，是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已经整整 100 年了。在当时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日益加剧，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更加腐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民族资本主义虽有发展，但受到严重压抑。进步知识分子为改变国家的命运，挽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9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救民族危亡，努力向西方国家学习。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却已破绽百出，贫富差别愈益扩大，工人运动不断发展。他们虽然主要是学习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说，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同时也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采取某些批判态度。

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中国某些书刊已谈到巴黎公社和欧洲工人运动。如王韬编的《普法战纪》即记述了巴黎公社起义及其惨遭镇压情景，说它是“保民而卫国，凡属苍黎，时蒸宵旰，此心所发，薄海咸知”。《西国近事汇编》也多次记载或报道欧美工人运动和社会党的活动，将其称为“康密尼党”，把社会主义译述为“贫富适均”、“贫富均财之说”、“康密尼士”和“康密尼党”，主张“欲天下一切平等，无贵贱贫富之分”。这些报道虽然很简单或不准确，但毕竟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让人知道在西方还有这么些事。

广学会在上海的出版物最早出现马克思的名字。据说，1898 年广学会出版一本胡贻谷翻译名为《泰西民法志》的书，其中讲到社会主义，讲到马克思及其学说。

《万国公报》也介绍各种社会主义，称其为“大同学”或“安民新学”。1899 年初，李提摩太在介绍颉德的社会进化论时说：“德国讲求安民新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称马克思为著名的“百工领袖”、“主于资本者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而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作者虽然不是赞成马克思学说，但承认马克思的资本学说“语语翔实”，“政学家至今终无以难之”。①

当然，无论是李提摩太或广学会的其他什么人，都没有正确介绍马克思主义。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或“安民新学”并没有确切的

① 《大同学》，原载《万国公报》第 121、123 期，1899 年 2 月、4 月。

含义，有时把马克思与主张单税论的亨利·乔治及空想社会者贝拉米、费边等社会主义者相提并论，有时与实证论者斯宾塞、进化论者赫胥黎混为一谈。《万国公报》把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当作“救贫”“均富”的“安民新学”加以介绍，实际上是作为他们宣传基督教救世说的一种补充，但又毕竟使它的读者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知道了马克思的名字。

20世纪初，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队伍日益扩大，留学过日本和欧美的人日渐增多。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迭遭失败的情况下，他们焦虑忧愤，急于寻找救国的出路，而日本恰于此时兴起社会主义思潮，所以他们在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也较多地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并在他们所出版的刊物上进行介绍。

中国人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并谈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就提到：“麦喀士(马克思)，德国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居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① 稍后他又说：“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述甚多。”“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檃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掠夺多数人之土地劳力而组成之者也。”② 还有文指出：“今之欧洲所以如饥鹰饿虎，汲汲然求逞其欲于世界者”，都是由于“少数资本家，求资本之繁殖也。呜呼，吾往日见专制君主之威势之野心为可畏，今日又见资本家之威势之野心，其可畏乃更甚也”。③

随着新刊物之增多，谈论马克思学说也多起来。如马君武1903年指出，社会主义发源于圣西门、傅立叶，极盛于德人马克

① 《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原载《新民丛报》第18号。
② 《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中国之社会主义》，同上，第42、46号。
③ 《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同上，第11号。

思:“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之人也。马克司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① 并附有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贫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书目。同时出版的《新世界学报》也介绍了傅立叶、欧文和马克思的学说,认为社会主义发生的原因,“即社会的不平而贫富之悬隔、贵贱之区别有以致之也。……下等人民之对富豪,上下之别,迥如天壤,苦心之士,乃为之发世界大不平之理,衷诉困苦”②。《国民日日报》在介绍德国社会党时指出:该党“向奉马枯士之革命的共产主义为圭臬”③。《浙江潮》则把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相区别,指出共产主义以德国之埋蛤司(Karl Marx)为代表,主张废除私有制,而归于国有;无政府主义以法国帕洛吞(蒲鲁东)、俄人勃宁(巴枯宁)为代表,主张绝对自由,废除国家,其手段则为“剑也,铳也,暴烈弹也,阴谋也”。这是在中国最早提到“共产主义”,还谈到“近世社会党蔓布列国,忽而同盟罢工,忽而集会演说,每年出版之劳动杂志数百万册”④。《政艺通报》则指出:“二十世纪之天地,欧罗巴之中心,忽发露一光明奇伟之新主义焉,则社会主义是也。其主义于现今世界,方如春花之含苞,嫣然欲吐。其将为大地所欢迎,而千红万紫团簇全球乎?抑为其反对者之所摧折,而绿残红愁飘零无迹乎?虽未可知,而要之其能腾一光焰,照耀众脑,万人一魂,万魂一心,以制成一社会党,其党人复占全球各党之大多数焉,则其主义之价值可知也。⑤ 《江苏》、《翻译世界》、《大陆报》等也谈论到马克思和社会主义。

当时在上海和日本还翻译出版了日人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党》等

① (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原载《译书汇编》第 2卷第 11 号。
② (近世社会主义评论》,原载《新世界学报》第 12 号,1903 年 3 月 。
③ (德国之社会民主党》,《国民日报汇编》第 1 集。
④ 《新社会之理论》,《最近三世纪变迁史》,原载《浙江潮》第 8、6期。
⑤ 邓实:《论社会主义》,原载《政艺通报》1903 年第 2号。

书。《近世社会主义》介绍了傅立叶、圣西门、欧文及路易·勃朗、蒲鲁东等人的学说,指出他们‘全为空理空想’;‘故全然失败’,只有马克思‘学识深远,思想精致’;‘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为一代之伟人’。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发明无二之真理,为研习服膺之经典’。并指出“必以学理为社会主义之根据,以攻击现社会,以反对现制度,而创立新社会主义,以唱道于天下,舍加陆马陆科斯其人者,其谁与归?”《社会主义神髓》则着重介绍了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指出“:近世社会主义之祖师加尔马参者,能为吾人道破人类社会组织之真相者也。其言曰:有史以来,不问何时何地,一切社会之所以组织者无有不根底于经济的生产及交换方法,而其时代之政治的及灵能的历史,惟建设于此根底之上者,亦实自此根底始可解释也。’恩格尔亦曰“:一切社会的变化,政治的革命,其究竟之原因,勿谓出于人间之头脑,勿谓出于一定不变之正义真理。夫惟识生产、交换方法之变化如何。’这些书虽然也有不足或错误,但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一些重要著作和观点,说明资本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趋势,则是明显的。

1905 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在积极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同时,也开始介绍马克思学说。孙中山较早接触到社会主义,他在是年春旅欧时,曾在布鲁塞尔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进行交谈,并请求加入该组织。他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① 接着他在《民报》提出了民生主义的主张。朱执信在《民报》2 号发表《德意志社会思想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也提到恩格斯,译述了《共产党宣言》的片断,论及《资本论》,指出‘马尔克素欲以阶级争斗为

① 《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原载《近代史研究》1979 年第 3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手段,而球此蚩蚩将以饿殍之齐氓 ”。在另文中又说“: 顾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社会主义。’① 宋教仁、叶夏声等也在该报谈到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该报宣称：“ 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② 革命派的《中国日报》、《鹃声》、《晋乘》等也谈到社会主义和社会党。

当时介绍《共产党宣言》较多的是《天义》报。它在新书预告中即有《共产党宣言》，说已在翻译。随后即发表宣言第一章及第二章部分译文。宣言译序说：“ 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故‘ 欲明欧美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篇。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篇，亦不得不奉为圭臬 ”。巴黎《新世纪》也谈到马克思和工人运动。

可以看到，辛亥革命前，中国不少刊物已介绍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运动，而且不难看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是把马克思学说当作一种最新学说进行介绍的，其中有些人甚至是抱着赞扬和欢迎的态度。

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对内加紧压榨，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愈加尖锐。马克思主义已广为传播，工人运动不断发展。中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国家学习、探讨救国方案的同时，在日本和欧美也亲眼看到这种情况，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富者益富，贫者益贫，阶级冲突丛生。因而接触到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将其看作是解决社会不平等和各种危机的学说而予以关注和介绍，使中国人开始知道马克思是大思想家，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新的学理。这是很有意义的。但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他们并没有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实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

① 《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原载《民报》第 5 号。

② 《民报〉与〈新民丛报〉辩论之纲领》,原载《民报》第 3 号号外。

就社会政治条件说，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且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清政府成为‘ 洋人的朝廷 ”,因而中国所面临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列强侵略和封建专制，特别是清政府腐败统治。在经济上资本主义虽有发展，但很微弱，工人阶级力量很小，因而摆脱外国压迫和封建束缚，发展资本主义是当务之急。当时各种刊物都把发展实业、发展教育科技当作两大急务，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因而尽管他们对资本主义采取某些批判态度，客观上只能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而且恩格斯去世以后，第二国际领导专注意于议会斗争“ 忘记了东方 ”,把殖民地问题排斥于民族问题之外，这就使落后国家更难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无政府主义却被看作是一种 “ 最革命 ” 的社会主义思潮，得到较广的传播。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一种反对压迫剥削、医治社会弊病的新学说介绍到中国，表示了欢迎的态度，这是难能可贵的，表明中国人热情追求真知的精神。另方面，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传播开，没有形成思想运动，而只能在知识分子中被误解和曲解，他们自以为是依照社会主义提出的一些方案，也只能是主观的空想的。

改良派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但也介绍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康有为的《大同书》无疑吸取了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的养分，表示要 “ 除九界 ”,即‘ 国界 ”‘ 级界 ”‘ 种界 ”‘ 产界 ”‘ 苦界 ’等 ,以实现 “ 太平大同 ’的激进思想。但是 ,他的这种理想不仅‘ 待之百年 ”方可实行 ,其办法也只是长期说教 ,以‘ 明天赋人权之义 ”,而后入天堂。他没有找到一条到达大同之路。梁启超承认社会主义 “ 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 ” ，却不承认社会主义实现是可能的。他说‘: 社会主义学说 ,其属于改良主义者 ,吾固绝对表同情 其关于革命主义者，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

数百年后。”① 他不仅将社会主义与许行说、王莽“分田劫假”混为一谈，甚至将垄断资本托拉斯说成“合于麦喀士之学理，实为变私产以为公产之阶梯”②。他认为“中国宜酌采社会改良主义”。

革命派同情社会主义，却又不能脱离资产阶级立场正确对待社会主义。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弊害和社会危机，故想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就预防资本垄断和将来之社会革命。孙中山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这是他的远见。他为防止资本主义弊害，而提出民生主义，主张民主革命、社会革命一起进行。并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环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③ 他的民生主义，主要是通过核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等步骤和措施，逐步实行土地国有化。这种主张显然是受亨利·乔治单税论的影响，是发展资本主义的，他却认为是社会主义方案。列宁说：“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正在经历这种高涨，从欧美吸取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已经是从资本主义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④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1912 年，他在上海社会党总部的讲演中称赞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阐发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然而又把自由平等博爱视为“社会主义之真髓”；其所主张原欲推翻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学说，而

① 《杂答某报》、《驳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论者》，原载《新民丛报》第 86 期。
② 《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原载《新民丛报》第 42—43 号。
③ 《〈民报〉发刊词》，原载《民报》第 1 号。
④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426 页。

以平和慈善消灭贫富阶级于无形”。并认为亨利·乔治的单税论，“深合于社会主义之主张”，“实为精确不磨之论”。后来他在《三民主义》讲演中又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之圣人’，马克思是‘科学派’社会主义。孙中山崇敬马克思，但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不能接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也没有承认唯物史观，而坚持民生史观。他认为‘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社会进化的原因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调和，阶级斗争只是社会进化时“所发生的一种病症”。所以三民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革命派的朱执信、马君武等人最早谈到阶级斗争，但他们也没有理解。马君武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与达尔文的生存斗争相混淆，强调‘争存’在任何社会都不可废，社会愈发达，“争存”一事‘益复杂而不息焉’，用进化论解释社会主义。朱执信称赞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说，赞成社会主义，但又主张‘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还作了专门论述。宋教仁对科学社会主义更认识不清，他说的‘真正社会主义’，一是‘无治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一是‘共产主义’，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不少人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分辨不清，也有人用民主主义解释社会主义，等等。

另外，有些人则热衷于无政府主义。如刘师培曾介绍《共产党宣言》，但反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认为‘惟彼之所谓共产党者，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之共产也。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中，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渐失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①]。在他们看来，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后，如建立无产阶级国家，实行集产制度，就是‘以国家代个人握经济之权，多数劳动者，昔为个人奴隶者，今一易而为国家之奴隶，或增一层之惨酷’[②]。表现了对集中大生产的

① 《共产党宣言》第1章译序，原载《天义》第16—19号合刊。

② 《苦鲁巴特金学术述略》，原载《天义》第13—14号合刊。

敌视和畏惧。巴黎出版的《新世纪》着重宣传了巴枯宁主义。在当时,他们对资产阶级革命感到失望,认为这不过是‘以暴易暴”,表示‘别筹革命之方”,但他们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是接受了所谓“激烈革命”的无政府主义。他们反对国家、政府,主张平等自由,是对封建专制的冲击,他们同情农民,鼓吹‘农民革命”,提倡“妇女解放”、“破除迷信”,具有积极意义。但他们设计的所谓‘人类完全平等”、“人类均力主义”,建立以农为主、半农半工的类似农村公社组织之类的方案,不过是带有复古色彩的乌托邦,是违背社会发展的空想。

1911 年武昌起义不久,由江亢虎带头组织了一个中国社会党,标榜社会主义。其实他们宣传的不过是空想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亨利·乔治的‘单税社会主义”、“均贫富”社会主义。该党号称‘支部四百,党员五十万”,而‘究竟了解社会主义的有几人”却很难说。按照江亢虎的说法“:当鼓吹时代只要他入党,晓得这个名词就是好的。”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党的刊物上也谈到马克思的学说。如绍兴支部出版的《新世界》上就曾介绍‘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讲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还连载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大部分译文,题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但他们所认为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使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付诸“实行”而已。他们译介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是为了说明“马氏之主张,与世界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未尝不相通也”,立足点是无政府主义。该党不久发生分裂,沙淦、陈翼龙等因反对袁世凯专制而遭到镇压,江亢虎则声明“遵命解散”,这个党也就消失了。

辛亥革命时其他某些报刊也谈到社会主义。如《东方杂志》8 卷 6 号发表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就曾提到“:近世社会主义的

① 《社会主义之今昔》。《江亢虎讲演集》,1920年版,第 27 页。

开山,咸推德人楷尔麦克,其《资本论》所述,意在集土地资本于社会，以经营共和的生产事业，所谓社会民主主义是也。”8 卷 12 号起又连载过《社会主义神髓》(高劳编译)等。辛亥革命后还翻译过若干介绍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实际影响不大。

总之,在 19 世纪末、特别是 20 世纪初，马克思的学说已开始传入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观点作了介绍，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客观条件和思想界状况，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传播开来，没有形成思想运动。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经过五四运动的激荡，马克思主义很快在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开来，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这时的国内外条件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所造成的。

辛亥革命是在比较完全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在广大群众中造成民主精神的高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却很快被大官僚大军阀袁世凯所篡夺，他摇身一变成了民国大总统。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心目中神圣无比的‘ 议会 ’‘ 宪法 ”,也成了军阀官僚政客手中的玩物和争权夺利的工具。革命志士流血牺牲，奋斗以求建立的中华民国，仍然在专制统治之下。正如时人的诗句所言：“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李大钊说：“ 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① 鲁迅则细致地描写出当时知识分子失望、彷徨的心态。他说道：“ 见过

① 《大哀篇》。《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① 孙中山屡经失败,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而陷入困境。他仍然在徘徊,找不到出路。

如果说共和制建立后,人们的失望彷徨之情,主要出于对民国共和真伪问题的疑虑的话,那场遍及欧洲大陆的战火,则把自由平等正义撕了个粉碎,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自己先生的奥秘,开始对资产阶级制度产生怀疑。长达 4 年之久的世界大战,给欧洲大陆留下的是满目疮痍,是令人震惊的灾难和混乱社会危机、经济和政治危机不断,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时常发生。这不能不引起中国知识分子极大的震动,中国人从世界大战的‘弹烟血雨”‘全欧陆沉之忧”中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正如李大钊所说的那样:“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洲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②

从对民国的失望到对“欧洲文明”的怀疑,中国人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过去所走过的道路而进行新的选择。当时,中国社会出现了两个新的变化:一个是中国民族工业利用列强忙于欧战的机会有了较快的发展,工人阶级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另一个是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积极宣传民主和科学,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努力探求新的革命思想和出路。陈独秀说:“吾人理想中之中华民国,乃欲挤诸欧美文明国家,且欲驾而上之,以去其恶点,而取其未及施行之新理想。’③ 李大钊则说“:我很盼望我们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思想、文学种种方面开辟一道新路径,创造一种新生活。”④ 可是,这新理想、新路径该是什么?他们一

① (〈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55 页。
②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第 565 页
③ 《时局杂感》,原载《新青年》3 卷 4 号,1917 年 6 月。
④ (新的旧的》,原载《新青年》4 卷 5 号,1918 年 5 月。

时还不清楚。正如鲁迅的回忆所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① 表明先进分子仍然在怀疑和困惑中进行艰难的探索。

正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及世界革命运动兴起,风起云涌,惊醒了正在寻求出路的中国先进分子,使他们看到世界文明的“新曙光”和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新出路。由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封锁和所谓‘过激派’‘洪水猛兽’之类的歪曲宣传,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并不完全了解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但是他们从当时的片断报道中很快意识到,这是不同于 18 世纪法国式革命和过去任何革命的完全新式的‘劳农革命’;它所建立的政权是‘劳农政权’,实行的是‘劳农主义’而‘劳农’正是人们衣食住用的创造者,谁也离不开的。劳农革命、劳农政权、劳农主义,这完全是新事物、新东西,而且对于他们是如此亲切和可以理解。于是在他们头脑中信仰过的‘法兰西式革命’的观念,遇到了新型的俄国式‘劳农革命’的挑战,而发生动摇,确立了‘劳农革命’的新观念。

李大钊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新纪元》等文,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认识。他在解释俄国革命时指出:“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俄国革命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②。他看到了当时弥漫欧洲的革命潮流:“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国式革命,二十世纪式革命”;这个革命‘是只能迎,不能拒的”。先进分子开始把探索中国的出路同俄国式革命联系起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① 《答国文学社问》。《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18 页。

② 《Bolshevism 的胜利》,原载《新青年》5 卷 5 号,1918 年 11 月。

然而在欧战结束后，许多人包括一些先进分子由于受到协约国列强的所谓“公理战胜”宣传的影响，为美国总统威尔逊14条和平宣言所迷惑，也跟着说什么“公理战胜强权”，以为可以根据“公理”收回丧失的主权，帝国主义会在“正义”的压力下退出中国。但是，严酷的事实无情地粉碎了这虚妄的幻想和迷梦。尽管中国是战胜国之一，而由帝国主义“五强”操纵的巴黎和会不但没有帮助中国收回被德国强占的我山东青岛及胶济路等权益，反而在日本的要挟下决定把它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又一次充当反面教员，给中国人上了深刻的一课：“为什么先生总是侵略学生呢”，经过这次惨痛的教训，人们开始想通了“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的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不论是东方的、西方的，都是一类不讲公理的强盗”。所以，当巴黎和会丧权辱国的消息传来，人们掩不住心头的愤怒，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首先为少数先驱者所接受，这时因山东问题在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中打消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而进一步传播开来。“公理”的迷梦醒了，真理的光辉才发扬出来。从此学习马克思主义带有广泛的群众性。身临其境的瞿秋白就曾说过：“当时学生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影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原因就在这里。”[①] 因此，从五四运动开始，在中国形成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五四运动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革命群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1919年5月，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创辟“马克思

①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研究”专栏,同时把他负责的《新青年》6卷5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他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宣称:“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所以他要把这“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介绍到中国。他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阶级斗争说“恰似一条金线把这三大理论联络起来”。① 随后,他发表文章揭露列强侵略和军阀统治,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②。他开始研究中国革命和近代思想史上的若干问题,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强调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宣传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适应我们生活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③“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尤应自觉其权威而毅然张用之”④。并指出“真正的解放”,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抗拒冲决,把头上的铁锁打破;“从那黑暗牢狱里打出一道光明来”⑤。他还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团结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鼓励革命青年与劳动群众相结合,推动中国革命斗争。

接着,陈独秀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宣称:“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这里显然是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①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原载《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② 《再论问题与主义》,原载《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③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原载《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④ 《要自由联合的国民大会》,原载《晨报》1920年8月17日。

⑤ 《真正的解放》,原载《每周评论》第30号,1919年7月13日。

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① “我承认用革命手段建立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② 他认为资产阶级“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哪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人的幸福,简直是妄想”;“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的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③。他在《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等文中,宣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学说，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他还强调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指出要造成无产阶级“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④ 并为建立共产党进行了多方面活动。

1920年，新青年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这前后出版和报刊译载的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自序》和《反杜林论》的一部分,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从破坏历史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伟大的创举》、《国家与革命》的一部分,等等，以及其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小册子，有力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广大青年和进步社团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和思想主流。他们思想解放，精神焕发，勇敢地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热烈学习马克思主义，歌颂劳工神圣，表示要与劳工为伍，并把这种学习同当前的实际斗争

① 《本报宣言》,原载《新青年》第 7 卷第 1 号,1919 年 12 月。

② 《谈政治》,原载《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1920 年 9 月。

③ 《国庆纪念的价值》,原载《新青年》第 8 卷第 3 号,1920 年 10 月。

④ 《无产阶级专政》(与黄凌霜的通信),原载《新青年》第 9 卷第 6 号,1922 年 3 月。

联系起来，同改造社会的讨论相结合，探讨中国革命的出路，从中很快涌现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周恩来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一开始就歌颂十月革命和当时世界革命，指出“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① 他着重宣传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指出要进行“社会改造”，要打倒列强压迫，打倒军阀官僚地主的统治；“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②。以磅礴的气概宣传着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他在新民学会的讨论和通信中明确表示：“赞成马克思式的革命”，赞成“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反对“补苴罅漏”的改良主义。指出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无论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所以只有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才是真正的出路。他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③。他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就没有动摇过。”④

周恩来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甚至因进行爱国活动被捕在狱中，还向难友讲述马克思学说，包括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总论同阶级斗争史、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及马克思传等。⑤他在旅欧通信中指出：“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

① （创刊宣言》，原载《湘江评论》第 1 号，1917 年 7月 14 日。

② （民众的大联合》，原载《湘江评论》第 2 号。

③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 2号。《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第 23 页。

④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第 131 页。

⑤ 《检厅日录》，天津周恩来纪念馆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